

山水风雨

龙凤龟蛇拱护姚城

余姚是一座山水佳美的城池，钟灵毓秀，从天文上来说，上应南斗宿十二度，到须女宿七度，在斗牛两星宿之间。从地形上来说，南列四明山，北濒巨海，西越曹娥江，东望甬东。南起崇山高峻，北际溟海横截，而以凤山中望，为姚城之座山。姚江发源于四明山，一脉东逝，穿越南北双城之间，奔腾入海。姚城历来有“一水两城，四灵卫护”之说法。四灵指龙泉山、凤山、龟山、蛇山四座山，沿姚江两岸，错列有序，拱护姚城，庄严之中透着秀气；其中的龟山与蛇山即处在梨洲街道境内。

一县而双城烟雨，双城间一水中流，双城内外四山拱护，风光奇哉特也！

龙泉山

龙泉山处在余姚城中，姚江自西而来，碧波盘曲，流经南北双城之间，越过龙泉山南麓，向东入海。山耸江边，岚气浮山；山托青峰，轻舟绕山而荡漾，山水相依，更增添了山的灵性。登山四顾，万家鳞栉，尽收眼底。

龙泉山是一座文化的山，山上景点众多。龙泉山南坡有“四先贤故里碑亭”，纪念的是余姚的四大先贤：两汉之际的高士严子陵，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明末清初的胜国宾师朱舜水，名邦遗献黄梨洲。故里碑亭西边有文昌阁。故里碑亭上方是吕文安祠，又名“永赖祠”，是纪念明代大学士（阁老）吕本的生祠（祠主在世时所建的祠堂）。吕文安祠之东原有谢太傅祠，祀明代大学士谢迁。

严子陵祠在龙泉山东南坡，祀汉代高士严子陵。严子陵祠的西边即为孙忠烈祠，祀明代正德年间江西巡抚孙燧。孙忠烈祠之西北有三孝祠，祭祀孙燧的3个儿子：都督孙堪、尚宝卿孙墀、礼部尚书孙陞。龙泉山南坡最高处有中天阁，阁初建于五代，明嘉靖初年成为王阳明先生的讲学处；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余姚知县刘长城在中天阁创建龙山书院，延师课

士。中天阁东侧有一口石井——龙泉井，常年不枯，无论天旱少雨，这一靠近巅峰的石井仍然清水盈盈。

中天阁上方原有“二王祠”，祭祀王阳明及其父王华，20世纪40年代被战火焚毁。至今，已被岁月的风雨吹打得只剩下一片荒凉的空基而已。二王祠上方即是龙泉山山巅，原有山崖活岩“祭忠台”。龙泉山西峰有朱舜水纪念碑，为明末清初的中日文化交流先驱朱舜水而立。

玉皇山

玉皇山，山在余姚北城之东，又称大黄山，亦名凤山。山之脊称为雁岭。汉时有虞国，任日南郡太守，惠政施及鸟兽，死后棺木返归余姚故里，有双雁随棺至余姚，不再离去，因而为名。北麓原有清泉，称雁泉，现已壅塞。

玉皇山上林木扶疏，岭脊亭榭亭亭玉立。登上山顶，整座姚城尽入眼帘。遥望西面，只见两道白水：南边的姚江，北边的候青江，穿过密密麻麻的楼宇商家、纵横交错的街道绿荫，在此山边交汇成一个“三江口”。山与水相邻，水与山相依，山清水秀，是余姚城中的一道山水胜景。

玉皇山顶原有玉皇殿，初建于宋代，明代万历年间扩建后，盛名始著。玉皇殿有大铜钟，据《姚江小志》载，此铜钟声如凤鸣，为余姚之宝钟，俗传此钟关系余姚科举之兴衰。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英国兵船攻破宁波，沿姚江西上，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英军火轮入侵姚城，登岸烧掠，捣毁城隍庙神像，火烧岳庙、天后宫，驻兵龙泉寺、接待寺；然后登驻玉皇山，抢走了玉皇殿大铜钟。英军在姚城放火3天，至十四日才退走。玉皇殿毁于20世纪60年代。

玉皇山自古有“神灯”，每当春末夏初黄昏无风雨之日，有“神灯”升空，灿烂如星，至中天而熄。登山观望，犹如晨星错落，百千万亿，遍布夜空，随风轻扬，或熠熠往来，或冉冉飞升，成一奇观。“神灯”的形式多样，有一灯独行者，有百十排列者，或一分为二数，或迎风疾驰；或排列一线，如星桥灯市；或高悬天半，或独蹿林间，煞是好看。前后可达

两三小时之久，才次第明灭。正如高官夜行，仪仗卤簿前导。明末文学家朱一是《姚江神灯记》、黄宗羲之子黄百家《观神灯赋》各专记此事。据说“神灯”现象除姚江边凤凰山之外，唯在庐山大天池亦有相同奇观。至近代，出于地面建设频繁等多种原因，玉皇山的“神灯”已经难以见到了。

龟山

按《康熙余姚县志》载：“白山像蛇，竹山像龟，与江北龙、凤二山，谓之四灵。”龟山又称乌龟山，在通济桥之东2500米处的姚江南岸，在凤山的东南方向，形如龟，其北一趾伸踞于姚江中。山脚有潭，称竹山潭，故龟山又称竹山。明代谢肃有《竹山潭秋望诗》：“一峰卓云际，不受江潮吞。维舟陟层崖，爽气舒秋旻。……目送东流水，遥向沧海奔。青气从何来，知是南溟云。”

龟山在县治东南2500米，因形状似龟而称。因山上原曾植竹，故又称竹山，山下有竹山潭。

蛇山

蛇山又称白蛇山，民间称作白山头，地处县治东南3里，在凤山斜对面，离通济桥往东3里的姚江岸边。山形似蛇盘于江边，故称蛇山；因汉高祖刘邦起兵前曾斩白蛇于泽中，遂称蛇山为白山。在蛇山之西有石墩，名紫墩。

龙、凤、龟、蛇四山，龙凤两山游栖姚江北岸，龟蛇两山盘踞姚江南岸，谓之“四灵”。加上县衙内之秘图山，为县城之五镇山。龙、凤、龟、蛇四山拱护姚城，历来称为“姚城四灵”。因而余姚得山水之利，历来是一座山水佳美、人杰地灵的城池。对此，中国著名建筑大师、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叹曰：“四山环抱、一水中流。了不得的好风水！”

此外，姚城四周尚有几座名山，简述于下。

秘图山

秘图山，地处县城中心。据说早在远古时期大禹治水时，曾把治理姚

江的图纸收藏于此山中，故称之为秘图山。时当东汉建安五年（200），东吴君主孙权委任朱然为余姚长，赴任余姚，择地于此建造县衙。自此之后，秘图山前即成为余姚县衙所在地，历时已达2000年之久。后经历朝增修扩建，形成体势庞大的古建筑群。直至1995年余姚市政府搬离，千百年来，这里一直是余姚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胜归山

胜归山地处县城之西北1500米，因外形如龟，原称圣龟山。位在余姚城区西北部。相传东晋隆安二年（398）时，孙恩在海岛起义攻入大陆，朝廷派将军刘牢之率官军镇剿，胜利归来时屯兵于此山，因此改名为胜归山。胜归山历来是游览胜地，名胜古迹集中在中山崖、东山崖、西山崖3处，以丰富的古代石文化遗迹著称。

中山崖的胡公岩，面南峭壁，下临深潭。自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起，在山上雕凿岩雕或摩崖石刻，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前后历时390余年，形成颇为壮观的岩雕群，创造了浙东地区绝无仅有的岩雕艺术珍品，亦是浙江省为数极少的摩崖岩雕群之一，现已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岩雕群上方刻凿“胡公岩”3个大字，为嘉靖三十四年余姚知县李伯生所题，题词下面是盘坐在莲花宝座上的观音大士雕像，座下浪涛滚滚、巨鳌游动，左右为善财童子、龙女，组成观音阁。岩雕群中最早的雕像是崖壁中间胡宗宪浮雕像，官服案座，依崖临渊，似在纵观他治理下的姚城。因年久风化，民国时期经人补刊石像，于其下雕凿“胡公殿”3字，塑造胡公坐于殿中理案像，并勒石记功。胡宗宪于嘉靖二十六年至三十年担任余姚知县，后升任浙江总督，最后官至兵部尚书。

胡公殿周围崖壁上遍布石雕佛像，东侧有高约10米的赤脚踏宝莲台的释迦牟尼立像，以及形态各异、横眉竖眼的多尊罗汉像；西侧有袒胸露脐、捧腹大笑的弥勒佛像，有手执破芭蕉扇的济公像。这些造像，神态逼真，造型巧妙，栩栩如生，体现了历代工匠精湛的工艺水平。除岩雕外，

中山崖的崖壁上到处可见古代摩崖石刻诗文，主要集中在中山崖右崖壁、岩雕“胡公殿”和“弥勒佛”周围，内容多反映佛教、儒家修身养性之说，亦有孙中山、拿破仑语录和名胜题词、名人诗录，共26篇（条），500余字，其前后刻凿年代与岩雕相近。

胜归山的东山崖有三潭，包括瀑布潭和一对姐妹潭，均印古代采石形成的石孔积水成潭。潭有四“奇”，即潭底不漏水，旱天不枯竭，雨季不泛滥，水清不变质，称作“圣泉”，其奥妙有待探索。另因其月夜在高处可同时看到3个月亮，故称“三潭映月”。

胜归山原有刘将军庙，系当时为纪念东晋将军刘牢之而建，至明万历年间改建为禅院，名为灵岩禅寺，后增设书院，是一所儒、道、佛三教合一的禅寺。1968年被毁。

风山（丰山）

风山，又称丰山，东临胜归山，地处于姚城之西北2500米，是余姚县城的靠山。因为山的轮廓形状像个风字，唐代前的所有地理志书都称作风山，后来不知何缘故而改写作丰山，有点不明所以。唐代《十道志》曾说：“山少木多石。”山之南北坡在古时特多古墓，都是空旷的大墓室，因年代久远，现均已坍塌不存。

西石山

西石山在县西1000米，原名西石头山，五代时又称作宝石山。原江中有落星石，高约2.5米，江潮满时，石仍突出江面，传说是天上落下的陨石所化。明代时有莫若鼎，认为姚江是当时主要的水上运输线，此石对姚江行船造成极大妨碍，船只航行至此往往遭此石而损坏，就出资雇人，将此石凿去，使航路通畅。自此之后，姚江运输就不再受江中巨石的妨碍了。原在此设立渡口，称西石山渡；山间有庙，称石头庙，用来镇江中之邪。山后又有护圣广济禅寺，明嘉靖年间建，因西石山又称断山，此寺亦称断山寺，至清中，改称接待寺，延纳四方行脚僧人。1956年，为建造龙山剧院，拆接待寺木材，寺毁。

中天气爽龙泉山

龙泉山不峻不高，亦无玲珑怪石与奇松岩洞，唯因坐落在“东南最名邑，烟水万人家”（范仲淹语）的余姚城内，更因有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先生讲学于此而闻名遐迩，成为文化底蕴深厚的姚城胜境。唐人方干曾有诗说：“未明先见海底日，良久远鸡方报晨。古树含风长带雨，寒岩四月始知春。中天气爽星河近，下界时丰雷雨匀。前后登临思无尽，年年改换去来人。”王阳明亦有《忆龙泉山诗》曰：“我爱龙泉山，山僧颇疏野。终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一夕别云山，三年走车马。愧杀岩下泉，朝夕自清泻。”

余姚地方虽小，却是双城挟峙，一水中流。登龙泉山四顾，万家鳞栉，尽收眼底。山的南麓，一条发源于第九洞天四明山的姚江自西而来，碧波盘曲，流经南北双城之间，向东入海。山耸江边，岚气浮山；山托青峰，轻舟绕山而荡漾，山水相依，更增添了山的灵性。地灵造就人杰，尤其在明清时期，“姚江人物甲天下”，以至有“文献名邦”之佳称。真如元代黄潘所唱：“舜江吾旧游，风物殊不恶。江水天际来，宛宛带郊郭。云帆渺沙渚，翠嶂森楼阁。”怪不得历代的隐士与诗人都企慕于此，自汉代的梅福，唐代的方干、孟浩然、谢遗尘，宋代的王安石、谢景初，明清时期的陶安学士、刘宗周等都曾携酒提鸡登览龙泉山，围坐峰巅巨岩，迎风举杯，邀月吟诗，何等的悠哉乐哉！

四先贤故里碑

余姚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历来有“文献名邦”之佳称，姚江两岸孕育了众多的名人学士，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姚江文化”。“故里碑亭”所纪念的4位先贤，是余姚众多名人学士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在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辉映千古。后人为了纪念这4位先贤，特建“四先贤故里碑”，它位于余姚城内龙泉山

南坡。故里碑始建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后因风化，至道光年间予以重建。20世纪40年代日寇侵陷姚城时，伪县长劳乃心把四块故里碑亭移至县政府内荷花池旁。碑上各覆盖石亭，碑有名，有亭额，亭有楹联。共和国成立后，出于某种考虑再迁移至龙泉山南麓（现龙山剧院处）。1958年，为扩建龙山剧院，再将故里碑上移到现在的位置。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故里碑”被红卫兵小将毁掉。1981年，按原状修复，并被列为余姚县文物保护单位。

第一块碑文是“汉高士严子陵故里”，楹联是：渺矣纶竿神汉远，依然城廓客星高。亭额是：山高水长。严子陵（前37—43）名光，又名遵，子陵是他的字。他曾游学长安太学，和刘秀结成同窗好友。当刘秀中兴汉室，建立东汉王朝时，严子陵隐居不出。光武帝刘秀派人四处查访，终于把严子陵请到京城，在紫禁城中与他同床而眠，彻夜长谈，向他请教治国良策，并由此而留下了“客星犯帝座”的佳话。光武帝要严子陵留京任职，被严子陵拒绝。几天后，严子陵悄然离京，来到富春江边，过着农耕渔钓的隐士生活。临终前回归余姚，死后埋葬在余姚城北的客星山。严子陵不慕富贵，不图名利，高风亮节，为后世所称誉。宋代的范仲淹曾写有《严先生祠堂记》，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来赞美他。

第二块碑文是“明先贤王阳明故里”，楹联是：曾将大学垂名教，尚有高楼揭瑞云。亭额是：真三不朽。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学者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书法家。他出生于余姚北城内的瑞云楼，文治武功，勋业卓著，堪称一代名臣。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最珍贵的在于学术活动。早年曾因反抗权宦而被贬谪到贵州龙场驿，但他不为困境所忧，潜心悟道，进行心学的研究。自此之后，经过长期的磨难、酝酿、总结，创立了以“良知”和“知行合一”为核心的心学体系，被学术界奉为心学大师。他注重人格的价值，追求个性的解放和主体意识的独立，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民主启蒙哲

学家，是近500年来思想变革的先驱。王阳明既有高尚的人格、完美的品德，又为国家建立了不世之功，更为后人留下了光照千古的学说，真称得上是一位“完人”。正如清代著名学者王士禛所说：“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这就是亭额所写“真三不朽”的内涵，他真正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的不朽，光照千古，道德文章皆为后人之楷模。

第三块碑文是“明征士朱舜水故里”，楹联是：东海蹈，曾甘家菟逊荒，千载斯文归后死；南天擎，独苦臣心如水，一江终古属先生。亭额是：胜国宾师。朱舜水（1600—1682），名之瑜，字鲁屿，寓居日本后取号舜水，是我国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杰出的教育家，以“胜国宾师”终于日本。他生活于政治动荡的明清之际，1645年至1659年间，他曾先后7次东渡日本，为抗清斗争而积极奔波。他看到清政权日益巩固，复明无望，因不愿做清代的顺民，遂寓居日本20多年，讲学以终。他的德行和学问受到日本学者的敬重，水户侯藩主德川光国聘请他到江户（东京）讲学，并拜他为师，这就是亭额“胜国宾师”的由来。朱舜水的讲学促进了日本儒学的发展，为日本的政治改良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并影响到后来的“明治维新”。朱舜水死后埋葬在日本，他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

第四块碑文是“明遗献黄梨洲故里”，楹联是：孝子忠臣，祀典千秋列东庑；儒林道学，史家特笔著南雷。亭额是：名邦遗献。黄梨洲（1610—1695），名宗羲，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是著名的学问家，博大精深的学术大师，浙东史学的开创者，明末清初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他年轻时发愤读书，钻研学问。当清兵南下时，他积极从事抗清斗争。到南明政权瓦解后，潜回家乡，隐居著述，致力于表彰抗清志士以及祖国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在哲学、史学、文学、教育等诸多领域做出了杰出的建树。尤其在浙东史学和学术史方面，有着开创性的成果，成为“浙东史学”的开创者。黄梨洲生活在“天崩地解”的动荡时代，对中国的政体及腐朽的思想体系做了无情的剖析与深刻的反思，提

出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政治见解，展示了博学多才的民主启蒙思想家的风采。

四先贤之风节、思想、学术、功业，中外传扬，百世流芳，堪称余姚历史光华之所在。

文昌阁

文昌阁在四先贤故里碑亭的西边，初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现存建筑是清光绪十九年（1893）重修。文昌帝君是道教中的一位神明，姓张，名亚子。据说是玉皇大帝命他掌管文昌府，管理人间功名、禄位，又称为“梓潼帝君”。在封建社会中，凡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前，往往要去参拜文昌帝君，以此来企求神灵保佑，取得功名。

吕文安祠

四先贤故里碑亭的上方即是吕文安祠，又名“永赖祠”，是纪念明代大学士吕本的生祠（祠主在世时所建的祠堂）。吕本（1504—1587），字汝立，号南渠、期斋。明代余姚三阁老之一。

吕本于嘉靖十一年（1532）考中进士，后由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累官至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晋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兼管吏部事务。吕本权势煊赫，资财豪富，即在余姚修造府第，余姚城南河头有“宰辅第”，俗称“大狮子墙门”，即是吕本的主要府第。此外还有江南的“乐志园”“上公旧闾”“玉兰堂”，姚江之北的“众乐园”，在绍兴还有气派庞大的“吕府十三厅”建筑群体。

谢太傅祠

吕文安祠之东的正面南坡原有谢太傅祠，祀明代大学士谢迁。

谢迁（1449—1531）是余姚县泗门人，明成化十一年（1475）状元，弘治八年（1495）入阁参与机务，后累官至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少傅，人称谢阁老。因谢迁为官秉节直谅，见事明敏，正大温厚，被称为“贤相”。

孝宗去世，武宗嗣位，日事游荡，嬉戏无度。更有太监刘瑾，为人狡

狠。正德初年，刘瑾勾结马永成、高凤、张永、谷大用等8位大太监，联成阉党集团，日日引导武宗以狗马鹰犬、歌舞角抵为戏，罔上诬下，政事大坏。谢迁会同李东阳、刘健等众大臣上疏，斥言刘瑾等8人弄权误国，请立诛杀之。但武宗正宠信刘瑾，没有采纳谢迁等的奏疏。而刘瑾知道谢迁率领大臣反对自己，怨恨日深，日日伺机谋害谢迁等人。谢迁知武宗宠信刘瑾阉党，朝政大事为阉人所戏弄，国事已不可为，只好辞去官职，致仕回家。正德五年（1510）八月，刘瑾因妄图谋反之罪被诛杀，谢迁得以恢复宦籍，仍家居。嘉靖六年（1527）二月，大学士费宏去职，举谢迁以代，晋少傅、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谢迁为相数月，以年老体衰为由，力求去职，遂于嘉靖七年三月获准，致仕还家。至嘉靖十年二月，病逝于泗门家中，年83岁。追赠太傅，赠谥文正。

谢文正祠初建于明代，后经历代重修。清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东进入浙，占据余姚龙泉山，焚毁谢文正祠。同治元年（1862），太平军退出浙江后，由谢氏后裔出资重建。20世纪50年代，祠宇破败毁弃，被夷为平地。1998年，整治龙泉山，在该遗址雕塑了一只金牛。按《史记·天官书》载：吴越地处东南，以十二次相配属丑，以二十八宿相配属斗、牛度。会稽入牛一度，余姚历来属会稽郡，入须女度之界，有金牛之说。另外，龙泉山还有一则关于金牛的传说：据说在很久以前，龙泉山中有只金牛，凡到每年的八月中秋晚上，就会走出来吃画上月华的草，吃完之后还留下一堆金子，然后钻入山中，年年如此。所以，每年过八月中秋之后，上山者即能够拾到碎金。人们也就把画上月华的草称为金牛草。后因世人贪婪，有人想捉金牛发财，被金牛识破真相，知道人心险恶又贪财，自此之后，再也不出来了。

谢文正祠前有褒忠祠，祀抗倭志士、太仆寺丞谢志望。今已毁没不存。

孙忠烈祠

在谢文正祠遗址的上方，即为孙忠烈祠，祀明代正德年间江西巡抚孙燧。孙燧是一位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谋反分裂，不惜以身殉难的忠烈之士。

孙燧（1460—1519），余姚县烛溪湖孙家境人，弘治六年（1493）中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郎中。武宗正德时，任河南右布政使，以才节著称，政誉甚好。正德十年（1515），孙燧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

江西南昌是明宗室宁王朱宸濠封地。宁王朱宸濠，系太祖十七子宁王朱权五世孙。朱宸濠轻佻无威仪，而善以文行自饰。他听从术士之言，自以为有天子之望，遂阴具谋反之心。他外结群盗，内通权佞，日夜窥视朝廷中的事态，伺机谋反。孙燧去江西时，他的前任已有两人被杀，两人罢归。正德十年（1515）十月，孙燧接受任命后，把妻子和儿子遣送回余姚，随身只带两名家仆赴任南昌。

孙燧到任后，朱宸濠谋逆迹象日益明显。他将朱宸濠的种种谋反迹象多次上奏朝廷，可是都被朱宸濠买通的佞臣宦官所截获，难以送达皇帝。朱宸濠察觉孙燧意图，十分恼怒，派人向孙燧送去枣、梨、姜、芥4种物品，暗寓孙燧“早（枣）离（梨）疆（姜）界（芥）”之意，逼迫孙燧早早离开江西。而孙燧拒收四物。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十三日，宁王朱宸濠起兵谋反，妄图夺取国家最高统治权。起兵谋反之日，宁王胁迫江西任职的官员，顺从谋逆。唯有孙燧当即大呼：“天无二日，吾岂从汝为逆哉！”结果被宁王残酷杀害于南昌城惠民门外。最后，宁王的谋反被王阳明平定。正德十六年四月，武宗去世，六月，新即位的世宗（嘉靖）诏追录孙燧功绩，追赠他为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忠烈”；荫一子锦衣卫百户。嘉靖三年（1524）二月，余姚知县邱养浩在姚城内龙泉山南坡建立“忠烈祠”，以示纪念。后来年久失修，破败不祀。2009年4月2日，由孙氏后人出资重修，塑像祭祀。

三孝祠

孙忠烈祠之西北有三孝祠，祭祀孙燧的3个儿子：都督佥事孙堪、尚宝卿孙墀、礼部尚书孙陞。

孙堪，字志键，善骑射，嘉靖五年武会试第一名，擢指挥同知，升都

督佥事。事母至孝，后死于送母丧由京师回归余姚的途中，年72岁。

孙墀，字志朝，秀才。事母极孝，送母丧回余姚，守丧期满不久，即哀毁而卒，年60岁有余。有子孙如游，官到大学士。

孙陞（1501—1560），字志高，忠烈公孙燧的幼子，世称“笃行君子”，精于文史，擅长古文词曲。嘉靖十四年（1535），孙陞会试中试，殿试时得赐一甲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孙陞以“养德养身养学”为终身之志，是明代中期学者型的名宦。累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赠太子少保，谥“文恪”。

明正德十六年六月，从江西传来父亲孙燧被南昌宁王朱宸濠杀害的消息，三兄弟叩地号天，五内俱裂，徒跣赴仇，发誓不与叛贼俱生。孙堪即率弟孙墀、孙陞，同赴国难。当叛乱平息时，即扶父柩而归，率两弟守墓3年，疏食3年，世称三兄弟为三孝子，名著宇内。后来，孙堪考中清嘉靖五年武会试第一名，孙陞考中嘉靖十四年殿试一甲第二名（榜眼），世人无不认为孙氏兄弟以文武科相继魁天下，是上天对忠烈公的报答。嘉靖三年（1524）二月，余姚知县邱养浩在姚城内龙泉山南坡建立“忠烈祠”的同时，于西侧别建三孝祠。咸丰十一年（1861），被太平军焚毁，同治初年，由孙氏后裔重建，至今尚存。

严子陵祠

孙忠烈祠之东为严子陵祠，祀汉代高士严子陵。

严子陵（前37—43），是一位历代传颂的高风亮节之士，出生于姚北严公山麓的下河严家村。年轻时，曾拜梅福为师，对道学进行了专门研究，取得高深的成就。梅福见严子陵好学有才，就把第二个女儿嫁给了他。严子陵外出游学，在长安太学和皇族后裔刘秀结为同窗好友。当王莽篡权建立新朝时，征聘严子陵出来做官。严子陵为洁身全行，抗命不从，拒绝了王莽的聘召。不久，刘秀誓师南阳，起兵推翻王莽政权。于此期间，严子陵曾多次到刘秀军营出谋划策，并向刘秀推荐将领，为刘秀的中兴汉室建有较大功勋。几年之后，刘秀中兴汉室，建立起东汉王朝，即位

为帝。严子陵怕被征召任职，即改名换姓，云游四海，隐居不出。光武帝刘秀派人四处查访，从齐国找到披羊裘垂钓的严子陵，把他请到京城洛阳。

严子陵在京城拒绝与达官显贵交往，还用巧语讽刺了权威煊赫的大司徒侯霸：“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光武帝刘秀把严子陵请进皇宫，论故道旧，请教治国良策。严子陵与光武帝同榻而眠，做彻夜长谈，足加帝腹而不顾，由此而留下了“客星犯帝座”的佳话。

光武帝想委任严子陵为谏议大夫。严子陵向往无拘无束的自在生活，拒绝了光武帝的任命。几天之后，严子陵悄然离京，来到富春江边，过着农耕渔钓的隐居生活。他的这种不慕富贵、不贪名利的崇高气节，以及不事王侯的高傲风节，一直被后人所颂扬，被称为“高风亮节”的汉高士。建武十七年（41），严子陵因病回归余姚故里，建武十九年病逝于家中，终年80岁，埋葬于余姚城东北的“客星山”，历代都有修葺，现已毁。

严子陵祠最早于唐代时建于严公山，后来迁至客星山严子陵墓右。宋咸淳七年（1271），在兴建高节书院时扩建严子陵祠，至元代后逐渐毁败不修。明代弘治中期，由浙江参政建祠于余姚龙泉山巅，以便瞻谒。嘉靖三年（1524），因原祠宇毁败，知县邱养浩于孙忠烈祠之东重建严子陵祠，成为历代祭祀严子陵的场所。现所存建筑是清代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严氏后裔于崇孝祠公款内拨资重建。

中天阁

中天阁在忠烈祠的上方，初建于五代，是明代王阳明先生的讲学处。详见《阳明先生讲学处中天阁》。

龙泉井

龙泉井在中天阁东侧的上方，是一口常年不枯的石井，即便天旱少雨，这一靠近巅峰的石井仍然清水盈盈，曾被苏东坡称许为“龙井石泉甘胜乳”。由于井水水面呈现两条波纹，如双龙戏水，故此称之为“龙泉井”，并以此名山，称作“龙泉山”。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任

鄞县县令的王安石应余姚县令谢景初之邀，亦多次登临龙泉山中天阁，遥看南天景色，谈诗论文。时值东南数省干旱，而此井盈满如故，王安石对此感到奇怪，即兴写下《龙泉寺石井二首》：“山腰石有千年润，海眼泉无一日乾。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人传湫水未尝枯，满底苍苔乱发粗。四海旱多霖雨少，此中端有卧龙无。”两宋之际的靖康年间，小康王赵构当躲过金兵追索之后，从温州、宁波回途经过余姚时，登龙泉山品尝龙泉井之水，甚觉甘美而大为赞赏。当他在临安（杭州）登基为帝（宋高宗），还派人至余姚汲取龙泉井水，装了十坛运往皇宫。从地质学角度来说，龙泉井属于一种裂隙泉，水源来自余姚城之南的四明山，通过地下岩层裂隙涌到龙泉山，从石井冒出，所以水质清冽甘甜，源源不绝。今人将龙泉山东大门进口处的水池题刻为“龙泉”，实属大误。

龙泉井下方，即中天阁东侧，原为“劳寿小园”，假山石笋，奇花异草，小巧玲珑，园中置有元代至正年间浙江行省郎中刘仁本在秘图山举行“续兰亭会”的《会图石刻》，后于20世纪70年代被毁不存。

二王祠

中天阁上方原有“二王祠”，于嘉靖十四年（1535）由大学士徐阶创建于余姚龙泉山巅，中天阁上方，以祭祀王阳明及其父亲王华。王阳明祠在西侧，以学生徐爱、钱德洪配享；王华祠在东侧，春秋祭祀。20世纪30年代被火焚毁，至今，已被岁月的风雨吹打得只剩下一片荒凉的空基而已。详见《二王祠追踪》。

祭忠台

经越二王祠遗址，在龙泉山山巅，原有一个极大的山崖活岩，上可围坐40余人，称为“祭忠台”，即现在阳明亭之所在。详见《血雨腥风祭忠台》。

朱舜水纪念碑

朱舜水纪念碑在龙泉山西峰——回鹰岩上，碑之北有舜水亭。

朱舜水（1600—1682），名之瑜，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中日文化

交流先驱，余姚四先贤之一。他在抗清复明斗争失败之后，不愿做清代的顺民，曾先后7次东渡日本，最后寓居日本20多年，授徒讲学，把中华传统文化传播于日本。当时日本的幕府将军德川光国亦亲执弟子礼，把朱舜水礼敬为上宾，称之为“胜国宾师”。朱舜水以他光明磊落的人格、平实渊博的学识，赢得了日本人民和学界的尊敬和爱戴。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朱舜水病逝于日本东京，并安葬于日本茨城县瑞云山麓。日本人民、学者，对朱舜水始终怀有深切的感情。为了纪念朱舜水，1982年7月，日本“朱舜水先生纪念会”代表团特于朱舜水逝世300周年之际，专程来到余姚龙泉山西峰建竖纪念碑，以示怀念。

文献名邦

1995年，龙泉山新辟东大门，门前竖有“文献名邦”牌坊，正面坊额上题刻“东南名邑”4字，这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对余姚的评语。谢景初继任余姚知县赴任时，作为好友的范仲淹写诗送行，诗中写道：“余姚二山下，东南最名邑。烟水万人家，熙熙自翔集。”谢景初在担任余姚知县时，留下了突出政绩。牌坊背面坊额上刻有“文献名邦”4个字，“文”字是指有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献”指学问渊博、熟悉掌故的学者，这是因为余姚自秦代建县至清代，历来特多名人学士，著作丰富，历史内涵丰厚，为全国各县市之冠，有“姚江人物甲天下”之赞誉，故此早在明代时，就把余姚称为“文献名邦”。

姚墟古迹

东大门之内，迎面可见“姚墟古迹”题刻。所谓“姚墟”，指的是虞舜出生之处。三皇五帝之一的舜帝，是中国上古时代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的部落联盟大酋长。按《史记》及《孟子》等多种文献记载，舜出生于姚江附近的“诸冯废墟”（姚墟），故此虞舜姓姚。在余姚一地，至今尚留存着较多的与虞舜相关的历史遗迹，古今众多的学者亦把余姚称为“姚墟古迹”。此题刻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树青先生，经过对余姚考察之后所题。

阳明诗刻

经越“姚墟古迹”题刻往上，突露南坡的斜面岩崖上，题刻着一首“王阳明诗刻”，刻的是王阳明的五言诗《通天岩题壁》：“青山随地佳，岂必故园好。但得此身闲，尘寰亦蓬岛。西林日初暮，明月来何早。醉卧石床凉，洞云秋未扫。”此诗原作于王阳明任赣南巡抚任上，军务之暇，于江西赣州的通天岩会友讲学。通天岩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风景佳美。这里的这幅题刻，是由民国时期任余姚县长的堵福诜所书。

堵福诜是绍兴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秀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教员，曾是郭静唐的老师。民国十六年（1927）五月一日，由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主席宣中华委派来余姚任县长，于当年十月二日卸任。民国二十年，经由蔡元培先生推荐，堵福诜再任余姚县长。后因政局变动而去职。此题刻当写于堵福诜任余姚县长期间。

四明阁

四明阁，现已迁建于龙泉山西麓，原来是清代内阁学士朱兰的藏书楼。

朱兰（1800—1873），字久香，号耐庵，学政朱文治先生之子，家住余姚北城东门外酱园街，门对碧波姚江，是清晚期名闻全国的考试官。他于道光九年（1829）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曾担任安徽、广东、湖北等地的学政，考察士子严正，严拒贿赂，为国家选拔了不少真才实学之士。他为官清正，立朝侃侃，风采俨然，但遭到同僚的排挤和嫉妒，最后只得辞官归姚家居。清同治元年（1862），朱兰在北城东门外的酱园街濒临姚江的岸边构筑藏书楼，每每邀集耆旧学友，饮酒赋诗、谈笑论文，读书其中，一时称作胜楼胜会。朱兰晚年潜心学术，尤重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留下了较多的著作。他更能以官俸施贫济穷，有不少善举，受到地方人士的好评。

四明阁建筑平面几近方形，三开间两层楼，四翼飞檐，楼下砖砌槛墙，远望犹如建在城墙之上，如一只展翅欲飞的大鹏凝驻城墙之上。登临

此楼，山色江光，风帆沙鸟，遥瞻俯瞩，灵襟洒然，确实是一处登临胜境。该阁保存基本完整，只是原有的藏书已经散失殆尽。时至20世纪末，因酱园街区改造，即将四明阁迁建于龙泉山西麓。

余姚城是历史文化名城，龙泉山是历史文化名山，名城名山，相得益彰，在它们身上正体现出了余姚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

血雨腥风祭忠台

一般60岁以上的余姚人都会记得，在龙泉山顶巅，即现在阳明亭的位置所在，原有一个极大的山崖活岩，突兀巅峰，上可围坐30余人，因这里曾是明代正统年间余姚人成器遥祭被权奸陷害致死的刘球之所，世人遂称之为“祭忠台”。到明正德年间，又有王阳明在山巅岩石的北面亲题“祭忠台，阳明山人书”几个大字。可时至现今，山巅巨岩不见了，人们也不知当时的那段腥风血雨的史事。

龙泉山山巅巨岩的底径原有6米多，高2米余，凌空突兀，气势甚伟。站立在山岩之上，可以遥望姚城四周：东招凤凰山，岚气迎紫；西寻姚江之源，奔腾东逝；南瞰四明群峰，列坐南天；北观客星、胜归，屏障溟北；西北可见凤山，暝色松楸相映；东南盘踞龟蛇，两山逶迤江边；俯身近看，山麓有龙泉寺，传来晨钟暮鼓，梵声远播；极目远眺，72峰山岚弥漫，一览无余。就是这块峰巅岩石，在明代正统年间（1436—1449）曾发生过一场坚贞之士声讨权奸的震撼人心的重大事件。

时在明代初年，余姚城里有一位义士成器，字不器，喜好读书，工于诗文，精于击剑，以义侠自喜，不愿入仕为官，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同时有刘球（1392—1443），字求乐，更字廷振，江西吉安府安福县人，少年时曾因避难至姚，隐居余姚多年，与成器结成知心好友。永乐十九年（1421），刘球赴京考中进士，授礼部主事，随后居家读书10年，从学者众。授礼部主事，参与编修《宣宗实录》，正统初年，改授翰林院侍讲，为官正直。明代是宦官专政发展到极致的时期，宦官集团是中国君主专制社会中一支野蛮的政治力量，他们以一种因生理缺陷所养成的对正常人的嫉妒，以加倍疯狂的恶作剧和贪婪参与政治活动。正统年间，即有太监王振专横乱政，朝政昏暗，边防战事又频繁不息。刘球眼见宦官祸国害民，

曾多次上疏，议论坚正，触犯了权宦王振。

正统六年（1441），刘球上疏反对麓川之役。正统八年（1443）六月，因禁城内奉天殿遭雷震击，刘球应诏上疏，提出10条建议，提出收回权柄、处置权宦的要求，疏中写道“古圣王不作无益，故心正而天不违之”，要求皇上罢不急之务，讲求至道，“则圣心正而天心自顺”等严正之论，直接指斥王振。结果触怒了权宦王振，王振即假借皇帝旨意，第二天，刘球即被逮捕，关入诏狱。王振对刘球恨之切齿，不几天，又将刘球秘密转移到暗狱之中，暗中指派爪牙马顺深夜潜入牢房，斧钺暴下，砍杀刘球，并将尸首割碎支解，掩瘞在牢房内的地下，惨毒至极。时年刘球仅52岁。同狱罪囚对刘球之死极为同情，暗中藏得刘球一只手臂，偷偷地转移递交到刘球之子刘钺手中，才得将手臂殓以棺木下葬。

成器获悉好友刘球被权宦陷害，冤死狱中的消息后，辄瞋目大骂。凭着一股义愤激情，当即写成《祭忠文》和《祭忠诗》，率领同志多人，提鸡携酒，登上龙泉山巅的这块巨岩，望北遥空祭奠好友刘球。《祭忠文》历述古今权奸之祸，凡三千余言，写得悲壮动人，字字血泪，感人至深。他北向招魂，沥血陈词，把刘球比作屈原，有“叩帝阍其无路兮”之叹，揭露了那个时代的黑暗。在权宦操纵的环境里，刘球敢于弹劾，成器敢于公祭，都是不顾个人安危，挺身维护正义的大无畏精神，可以做世励俗。

他的《祭忠诗》亦是一腔悲愤之声，倾泻而出。诗曰：“万古兴亡泪满笺，一坛遥忆祭忠年。大书笔在凭谁执，高调歌沉待我传。无地可投湘水裔，有天应照越山颠。布衣悯世尤堪吊，何处松楸是暮田。”

祭奠完毕，又将祭品颁发给同志。于此之后，余姚人即将龙泉山巅这块巨岩称为“祭忠台”，并以此比之为宋代谢翱祭奠文天祥的西台。通过祭忠一事，使后人领会到这是一股历史清流对抗肮脏浊世的有力冲击。成器是一介布衣，敢于挺身而出，登山祭忠，堪称众醉独醒，难能可贵。至代宗景泰年间，刘球冤案得以昭雪，诏赠刘球翰林学士，谥“忠愍”，于

其家乡安福县立祠祭祀。

明正德五年（1510）十一月，阳明先生景仰翰林侍讲刘球的人品，在离任庐陵知县，途经庐陵县西北的安福县刘球故里（山庄乡连岭村，古称葛溪）时，专门去祭祀刘忠愍祠，写下《过安福》诗：“归兴长时切，淹留直到今。世事应无补，遗经尚可寻。含羞还屈膝，直到愧初心。清风彭泽令，千载是知音。”在安福，阳明先生有门人刘晓、刘文敏、刘邦案、刘明、邹守益等为代表的学人，后来形成“江右王学”。

正德十六年（1521）九月，阳明先生向朝廷请假获准，回余姚故里，拜祖茔，省亲朋，日日与宗族亲友宴游。钱德洪等即于此时拜阳明先生为师，请上龙泉山中天阁讲学。

时至嘉靖元年（1522）二月，王阳明父死，丁忧在家。于中天阁讲学之余，王阳明攀登龙泉山峰巅，面对峰巅巨岩，浮想联翩，深感刘球满腔正气，敢于指斥权阉王振，并联想到自身也曾因指斥正德年间的权阉刘瑾而被贬官贵州龙场驿，受尽艰辛，相同的心志和遭遇，使他一时心潮难平，特要人拿来笔墨，在岩石上亲题“祭忠台”3个大字，每字有0.27米见方，旁书“阳明山人书”5字，亦有0.1米见方大小。

与阳明先生“三十年来同出处，清晖楼对瑞云楼”的邻居诗友、官至南雄知府、时正告假回籍养伤的倪宗正亦为“祭忠台”留下诗句：“忠节重为天下惜，英魂疑自朔方来。”题下自注：“刘忠愍公球，死诏狱，我邑布衣成器，用鸡酒祭之于龙泉之顶，后人名其处曰祭忠台。”时至万历年间，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怪才李贽撰著《续藏书》时，更把刘球列为“忠节名臣”之首。

自此之后，龙泉山峰巅的“祭忠台”就成了余姚人祭祀忠烈之士的一个著名景点，时时有人登山遥祭。突兀于龙泉山巅的一方巨岩，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成器的祭忠、阳明的题石、倪宗正的赋诗，都是忧时爱国的情结，有着深沉的文化内涵。在此可使人增生扶正祛邪之心，产生

浩然之气，洋溢着先贤不畏强暴的精神。

“文革”期间，祭忠台被炸毁了。存在500多年的祭忠台就此毁没不存。小将们所毁没的不仅是忠奸斗争的历史，更是余姚气节之士的血泪遗恨。不几日，即在炸毁祭忠台的遗址上用砖头水泥新建起高大四方形“忠”字台，边阔6米多，高8~9米，四面高墙画上巨幅伟人像。

1984年，在原祭忠台炸后残存山岩遗址上建造阳明亭，以供游客登山小憩。如今历史遗存在游客眼中仅是残存的几块乱石碎砾，何曾想到这里还曾发生过的忠奸相争的腥风血雨？后来或许有人提醒，作为龙泉山上主要景点的祭忠台已了无踪迹。

站在废墟中建立的阳明亭中，追思曾经存在的兀然挺立的巨岩，傲视几千年的历史风雨。面对这座杂树丛生的祭忠台遗址，一想到这古老的文化背景，仿佛让人们进入这个背景之中，找到了俯瞰现代人的感觉。就是这股中华民族的正气和节义，使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二王祠追踪

龙泉山，又名屿山，山上原有较多建筑，有唤仙亭、更好亭、龙泉亭、虞世南碑、中天阁、龙泉井、明代王箴的《龙泉铭》碑、二王祠、严子陵祠、忠烈祠、三孝祠、谢太傅祠、吕文安祠、文昌阁等。在现存的中天阁上方，接近龙泉山巅，有一块极大的空旷地基，不少市民于此晨练，舞剑、练拳，煞是热闹，这就是原二王祠遗址。

二王祠规模不大，最初由明代大学士徐阶于嘉靖十四年（1535）动议兴建，以纪念王阳明两次讲学于此，曰“新建伯祠”，后由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傅凤翔完成，3间，设立阳明牌位祭祀之。东侧建海日祠，以祭祀王阳明之父、南京吏部尚书王华，3间；二祠合称二王祠。

王华（1446—1522），字德辉，号龙山公，明成化十七年（1481）状元，是王阳明之父。弘治年间（1488—1505），王华担任少事兼侍讲学士，即明孝宗皇帝的老师，升礼部左侍郎。正德初年（1506），当王阳明因反抗阉宦专权乱政，被充军到贵州龙场驿时，王华被明升暗降为南京吏部尚书，不久又被借故罢免，贬归余姚家中。嘉靖元年（1522），王阳明的伯府第在绍兴建成，举家迁居绍兴，二月，王华即死于伯府第中。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书法家，人称“心学大师”。正德初年，王阳明因反对权宦刘瑾专权乱政，犯颜抗疏，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3年后升任江西庐陵知县，历江西巡抚、两广巡抚、都察院都御史、湖广军务总督、南京兵部尚书，因功封“新建伯”。他创立阳明学说，倡导思想解放，人格独立，给人以成圣之路。王阳明文治武功，勋业卓著，堪称一代名臣。

明万历年间，建神龛二座，冠带袍笏塑像，据史载：王阳明谪贵州龙场驿驿丞时，受山岚瘴气熏染，故此塑像脸带青色；以学生徐爱、钱德洪配享，春秋祭祀。

明末清初，中天阁、二王祠被毁。清顺治八年（1651），由知县胥庭清重修，格局显崇。至乾隆时，县知事刘长城在中天阁创办龙山书院。咸丰末年，太平军东进入浙，占据余姚城，驻兵龙泉山，由于非佛非儒，山上儒学祠宇和佛道寺庙建筑多遭毁损，所有树木被砍伐，二王祠亦遭到重大摧残。同治元年（1862）七月初八，太平军败退撤离余姚城时，于焚毁中天阁的同时焚毁了二王祠。事后，被没收的十八局局头黄春生百亩田产充作龙山书院学费。时由著名儒学大师宗稷辰主持书院事务，聘请杨泰亨等来书院讲学。即由龙山书院拨款重修中天阁和二王祠。二王祠虽经修复，然以岁无恒费，因陋就简，规模未宏。

岁月流转，至民国十六年（1927），二王祠已是楹栋霉蚀，神龛裸室，浸凌于风雨之中。时由蔡元培推荐堵福诜两任余姚县县长，任期分别为民国十六年五月至十月及民国二十年五月至二十二年二月。堵县长莅任余姚，见二王祠破败不堪，民国二十年时，即建议将王阳明、王华两祠合建为二王祠，写有《倡议修建余姚二王祠缘启》一文，文极佳美，因文长不录。

堵福诜酌募集修祠经费3000银圆，有县长之倡议于前，即有乡邦士大夫解囊于后，遂指派史士瑜、邵子传、董为承办其事，于原有6间的基础上再加建一间，合成7间。祠四周筑围墙。南辟正门，由马一浮题门额曰“二王祠”。各方多赠匾额，书家于右任及省长张难先等赐题楹联，祠貌焕然一新。

在此仅录楹联两副，第一副：名世五百年，辅濂洛关闽各学支离悉刊，能真传古圣心法；狂澜千万丈，有龟蛇龙凤诸峰环拱而立，犹喜见先生祠堂。

第二副：公真旷世奇才，卅载谟猷，砥赣江流，平闽海波，扫粤峤蛮烟，明代功勋照史策；我向贵山私淑，三年讲习，登寅宾堂，过君子亭，访玩易居室，故乡文化有师承。

1935年，余姚县立民众教育馆同人拜谒、祭奠阳明先生祠，对二王祠

有所描述：“四周的围墙，现已改建洋式，好像敷上了红粉，中置铁门，紧闭加锁，人们从靠右的小门出入，里面天井宽阔，铺着水泥平滑，两座菱形式的小花坛，分列左右点缀着。步上檐阶，右边第二室，阳明先生的父亲王华公的塑像，高坐在上面。西部的屋内，塑着阳明先生的造像，蓝颜黑须，道貌庄严。据民间传说，阳明先生做龙场驿丞的时候，那里瘴疠之气很盛，先生常常吞服白砒以解毒。因为常常服吞白砒，他的生命固然保全，可是他的脸孔从此变作蓝颜色了。像架柱上各刻着龙形，金色辉煌，光彩夺目。像架之下置着石桌一座，桌上摆着树制的烛台和石香炉，都饶有艺术的意味。两旁有几副很好的对联，现在把它记录下来，作为纪念先生学术的意思。”1941年，日军战火烧到浙东，余姚沦陷，民生惨遭蹂躏。沦陷期间，龙泉山由日军警备队驻扎，禁民上山。山上建筑均遭破坏，文物无人管理，众多建筑如乡贤祠、谢太傅祠、吕文安祠、忠烈祠、中天阁、二王祠等祠宇多遭毁损。二王祠内王华、王阳明衣冠亦被日军窃到日本。

抗战时期，堵福诜遭遇战乱兵匪之劫，家境从此贫困。抗战胜利后，由姜枝先出面，以修复二王祠之名义，向居沪姚籍人士募得款项，以备重修二王祠。此款后被送往四明山移作了他用，二王祠未能修复。

1949年5月，余姚解放后，山上建筑如中天阁、文昌阁、孙忠烈祠、三孝祠、吕文安祠、严子陵祠等，得以择要修葺，改用作社会之需要。处于山间最上方的二王祠，因破败严重故难以修复。后来，破旧祠宇逐渐倒塌，祠材等先后被挪用、搬空，直至今天，已被岁月的风雨吹打得只剩下一片荒凉的空地而已。另有吕文安祠东侧的谢太傅祠，亦因破败严重，于20世纪60年代拆掉，成为一片空地。山上原有的几座石碑坊亦先后倒塌，石料被人搬走，挪作他用。

阳明先生讲学处中天阁

王阳明先生讲学处——中天阁，在余姚城内龙泉山南坡。

中天阁，屋檐飞在云端，南窗洞开，登楼伸手，可揽白云。睁目远望，岚气在脚底升腾，松风在耳边吹拂。松风送入楼阁中，却似有人在吹埙簾，又好像一阵雨飘过，送来水激崖石的声音，有时激越，有时呜呜。南天一抹青黛，即四明山也。身在阁中，遥对南天，一览无余。古人确实聪明，选择此地构筑楼阁，使之占据了俯瞰的优势，独享浙东美景。可以赏景，可以感慨，可以吟诗，可以遐思，可以举杯邀明月，可以迎风唱离骚。山在云端，楼在云间，登楼足可以使人思接千载，神游万里。身在此楼中，极尽山川之韵致，唐代诗人方干曾赋《登龙泉山绝顶诗》于此。

中天阁初建于五代，即取唐人方干《登龙泉山绝顶诗》中“中天气爽星河近，下界时丰雷雨匀”之句，名之为中天阁。中天阁内，环境幽静，红柱青瓦，四周绿树参差掩映，光影斑驳。春月桃花似笑，夏月榴花似火，秋月桂香浮动，冬月蜡梅怒放。宽阔的前廊遥对南天，一览无限，确实是一处读书做学问的佳境。身在王阳明先生讲堂，聆听先生的谆谆善诱，把“心学”解说得透彻明白。满堂学生引颈静听，使得势利纷华之染日无，砥砺切磋之心日浓。

明正德年间，中天阁由大儒钱德洪开辟为讲堂。正德十六年（1521）九月，王阳明归余姚省拜祖莹，被钱德洪、夏淳、范引年、诸阳、柴凤等74人迎请到中天阁拜为师，确立了师生关系。

嘉靖元年至六年（1522—1527），王阳明丁父忧家居期间，即在中天阁讲学，规定以每月朔、望、初八、廿三日为阳明先生亲自开讲之日。每遇王阳明开讲之日，听讲者达300余人。其他日子仍由钱德洪主讲，讲授王学，学生称钱德洪为教授师。王阳明还为学生订立学规《中天阁勉诸生》，亲自书壁以告诫学生。

王阳明亦有《忆龙泉山诗》曰：“我爱龙泉山，山僧颇疏野。终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一夕别云山，三年走车马。愧杀岩下泉，朝夕自清泻。”王阳明学生钱德洪后被尊奉为明代大儒，当王阳明去世之后，钱德洪曾因触犯龙颜而下狱。当他获释离开京城天牢时，即周游四海讲学，想到先生王阳明的一生苦难，又想到自身的艰难遭遇，联想到故乡龙泉山美景，他即挥笔赋诗：“龙山只在蕙江阳，钟梵悠悠燕雀翔。绝顶龙潜含雨气，中天山翠接江光。梦回乡国堂垂白，秋到东篱菊正黄。南望伤心一挥泪，钱塘野渡正苍茫。”

明末清初，中天阁日见荒废，后变为尼庵。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余姚知县刘长城考虑到这里本是王阳明先生讲学之处，理该继承王阳明先生讲学之风，特重建为书院，高悬“齐云轩”匾额，延师课士，称为“龙山书院”，首任山长为李惠适。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太平军忠王李秀成部全军入浙。十月，侍王李世贤部属左军主将保天义、黄呈忠、赓天义阮士珍、志天义、何文庆，于二十一日占领上虞县城丰惠。二十二日，余姚十八局将领黄来昌输款于上虞的太平军将领黄呈忠等，遂进兵占领余姚城，占据中天阁。十一月初八，太平军攻占宁波城。后在宁波英法美领事的干预下，同治元年（1862）七月初八，太平军败退撤离余姚城。就在太平军败退撤离姚城时，一把大火焚毁了中天阁。光绪五年（1879），知县高桐募款重建书院，即是现存的建筑，五开间两层楼，古朴稳实。

现存的中天阁正厅有一副明神宗的御笔楹联：“智水消心火，仁风扫世尘。”上首，一轴王阳明先生的画像，广额高颧，清癯严肃，削腮络须，沉思的眼神，太阳穴上左三右四共7颗黑痣，真正是王阳明先生的本来神态。就是这位哲人，冲决了弊病百出凝固僵化的朱熹理学，本着深沉的思考，经过长期的磨难、酝酿、总结，以“致良知”的哲学命题超越了前贤。他注重人格的价值，提倡个性与思想的解放，以“因时制宜”“随时变易”的崭新观念把“心学”发展到最高范畴，使人们摆脱世俗的束缚，自由自在地生活。

“阳明学说”曾远播东瀛，在日本有着“国学”的崇高地位，东瀛学人巨子先后西渡，专程莅姚，登上龙泉山拜谒王阳明。1992年，由余姚学人诸焕灿请得日本姬路大学古川治教授在中天阁举行《日本的阳明学》学术讲座，为中日文化交流添写了新的篇章。

王阳明先生讲学处——中天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已布置成王阳明讲堂的形式。

姚城旧水系

余姚本属东南水乡，旧时的姚城境内河道遍布，河上小桥，或平板，或拱形，各具特色。临河人家，出门便是河埠，洗涮担水，观望小舟舞桨；夏天的夜晚，大人小孩聚坐桥沿栏板上，俯首河中清碧的流水，言说本地的传说故事和自身经历，何等惬意。而且旧姚城的河流，均与姚江相通，活水有源，流水清澈，水中游鱼，嬉闹逐食，河中小舟，直溯大江。

姚江之水自西而来，江水进姚城之前一路直泻，流经南北双城，将无穷福祉输送给了余姚；待江水离城东逝，经郁家湾，却是盘旋曲折，曲绕向东，出现好几个湾道，据说这与风水相关，阻止了风水外泄，曲折的江水把福祉遗留在了姚城。故此，余姚虽区区一县，却蕴含着无穷的气势，成为佳美之地，形成“姚江人物甲天下”的历史趋势。

姚江之上，舟楫水运事业繁忙，自明代起，舟山、定海、岱山的捕鱼人，驾驶海舶，经甬江转入姚江，一日夜即至余姚。船中满载黄鱼、带鱼、墨鱼、海蜇等海鲜，停泊于通济桥东侧的南北两岸。通济桥迤东，由冰鲜行、鱼秤手等行户进行交易，贩运至城中里弄及城外各地，可见当时海鲜交易之繁忙景象。通济桥迤西，牌轩下的水门口，埠头宽阔，百官船、脚划船、乌篷船，沿江排列，姚城居民出行全靠乘船，可东至甬上、海东，西至曹娥、越城，便利至极。

余姚有南北双城，“浙东第一桥”通济桥沟通南北，双城构建有先后，水系均布，碧水流淌于城中。时而登桥远望，另是一番心情。姚城南屏四明山，遇雨，山水北泻，必然会淹灌姚城，故此沿江南城南城墙约500米之遥挖掘有最良江，东西两端与姚江贯通，以排泄四明山来水，保障姚城不致遭受四明山水的淹浸。

江北城，始建于东汉建安五年（200），扩建于元代至正十七年（1357），龙泉山被包裹于城内，有陆门五，水门三。城外四周挖有护城河，出城之

南门齐政门即姚江，有通济桥与南城相通；东为三官堂江，出东门通德门有澄清桥；北为候青江，出候青门有候青桥，出武胜门有武胜桥；西为六浦江，出龙泉门城有六浦桥；西南城墙转角外有仁寿桥。四江至今尚存。城内挖河通水，南与姚江、北与候青江连通。

北城中心有水流，起自西水阇引候青江水入城南流，俗称智慧桥江，经大闸弄、来家弄、智慧桥、新街口、助海庙、鹤行街，出牌轩下、水门口而入姚江。是水经西水阇后，即分一水西向流经崔家桥（原阳明医院大门口），依太守房分一水向北，流至北城墙而止。主流流至管家弄，又分为两流，北流之水经都司房至北城脚下；西流之水经宅下暗道流向碧溪井头、矮桥头、瑞云楼与清晖佳气楼之间，再往西先后分成6条支流：一水依清晖佳气楼向北，流几十米即止；一水向北经高地坂至城脚；一水径直西向经操场坂、原余姚中学大门与操场之间，再北流至县苗圃；一水往南流向瑞云楼西侧，再西折而汇成一水池，再转南至邬家纱帽地，亦汇聚成一水池；池水入口处又分一水，沿龙泉山西麓向南，流至第一山，过古月池仙桥后成一大池。

智慧桥江水流过智慧桥时，分一水折而向西，流经将坛，至管家弄南端而止（现桐江桥菜场南门）。智慧桥江水流至新街口时（现华联大厦西北角），分一水东流为桐江，桐江之水流经桐江桥、秘图桥、银锁桥、金锁桥，北折经毛家桥、宪卿第、直神弄、邵义庄，出东水阇而入候青江；在经直神弄后，又分一水东流，沿邵帅第至东城脚下，折南流至蒋家湾头（天主堂东侧）而止。桐江之水流经秘图桥西侧时，分一水而南，流至城隍庙门前，转而向西，与县署前秘图湖相通，受秘图山之水。秘图湖即县署内的荷花池，至六七月间，满池荷花，就会让人想起宋代周敦颐《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情意。

另外在龙泉山西侧、都司衙门前、清晖佳气楼后，有几处槽斗河，形若饲养牲畜的槽斗，不与外河相连通，属长度较短的死水河。

江南城，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因抗击倭寇而构筑，由此形成一

县双城、一水中流的特殊格局，有陆门四，小陆门二，水门二。四周有护城河，北即姚江，出北固门即为通济桥，与北城相沟通。绕城之水为清风港，西北角引姚江之水，沿城墙由北向南，过西成门（新西门），折而向东，沿南边城墙，过南明门，至东南角折而北行，过东泰门，水流再回入姚江。出西成门为新西门桥；出南明门有南门桥，往南直通最良桥；出东泰门有东泰门桥。

南城之北的姚江分3条水流引入江南城：小黄桥、右达门、左通门。

最西边之水入小黄桥，为下寺桥江，经下寺桥，南流至寺桥头，折而东流，至落马园与小黄桥江相接。是水流至下寺桥稍南，分一水径直往西（现余姚日报社南侧），又稍南转西，沿西门直街至新西门城墙脚下。

小黄桥稍东即为小黄桥江，自史家埠头之西的小黄桥引姚江水经右达门入城，流经十字街西、上寺桥，南流至落马园，与西来的下寺桥江相汇合，再东南折流至南河头，过清河桥，稍东北折转东，并入西来之水。

小黄桥江流经上寺桥、花园里之后，即分水向东，流经谭井弄南端，沿柴行街流经宰府第、天官府，过矮凳桥、东天宫、黄忠端公祠，稍东即与清河桥来之水相汇合，往东流经高升桥，至花园桥与石巍桥江相汇合。

与北城的和鸣桥相对，有石巍桥江，引姚江水经左通门，过石巍桥，沿紫行弄而南流，经棖星桥，至花园桥与西来之水相接，再南流至巽水门出城，流入清风港。石巍桥江水流经过棖星桥时，分一水向西，流经学官前，分水入泮池，继续往西至向家池而止。石巍桥江流过花园桥后，与西来之水相汇，继续往南，至离南城墙半里处，分一水流往西，流至高升桥后（称高桥头）形成一个大水池而止。

东泰门内有一水，沿东朝街径直向西，流经高家弄、杨家弄、汤家弄、鲁家弄、莫家弄、套环弄，转北临近棖星桥即止；是水经过鲁家弄后，分一流向北，经紫金桥后，流几十米即止。

靠近西边城墙有一处水池，面积约80平方米，长满茭白，称茭白池头。

双城水系，遍布城中，畅流临河之家，给姚城居户带来极大的便利。如若家境富裕的临水居户，家备木船，随时可以驶船出城，径由姚江分赴东西。回顾20世纪初期，当你站立桥头，指点姚江城墙，山色江光，风帆沙鸟，遥瞻俯瞩，灵襟洒然，正有无穷之乐哉！

四明山和姚江

四明山，古称句（读gōu）馀山。《山海经·南山经》“句余山条”写道：“又东四百里曰句馀之山，无草木，多金玉。”郭璞注说：“今在会稽馀姚县南，句章县北，故此二县因此为名。”《晋书·地理志》也写道：“余姚有句馀山在南。”又名鬼藏山，《洞渊集》写道：“秦时驱山塞海，鬼神劳役，奔入四明不出，因名鬼藏山。”山有二百八十峰，西连上虞，东合慈溪，南接天台，北包翠赜。中峰最高，上有四穴，若开窗牖以通日月之光。秦汉时期，曾将四明山和天台山总称为天台山。时至唐代，诗人谢遗尘隐居于南雷，循迹入山，探究石窗（四窗岩）之胜迹，特写了《九题诗》，遥寄友人陆龟蒙、皮日休等倡和，说：“吾山之奇者，有峰最高，有穴在峰上，每天地澄霁，望之如牖户，相传谓之石窗，即四明之目也。”谢遗尘《石窗》诗云：

高阁云中见，四窗一面连。梯空寻地穴，炼石举危天。

宝镜开霜晓，珠帘卷暮烟。自从刘阮后，康乐亦遥传。

自此之后，即将天台山与四明山分离，而别称之为四明山。《唐书·地理志》编纂付梓时即正式改称为“四明山”。宋人王应麟《七观》中说：“东有山曰句馀，实维四明是也。”

四明山历来为著名道教圣地，按道教典籍《云笈七签》《丹山图咏》《七十二福地记》等记载：“天下之洞天三十有六，四明山为第九洞天，名曰‘丹山赤水洞天’。”在《洞天福地记》中还说：四明山中的梨洲，是魏道微升天成仙之处，为第五十九福地。茭湖渔澄洞，始，皇先生（皇初平）曾隐居于此，为道家第六十三福地。大隐山亦被道书称为道家福地。一洞天三福地，真是美哉，正如晋代孙绰在《天台赋》中所说：“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天台、四明，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也。”从中可见四明山与道教的渊源。

四明山由于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东晋时有孙恩转战于此，击败高雅之所率领的官军。唐肃宗时有龚厉占据大岚山，与官军斗争达两年之久。唐代宗时有袁晁起义，曾在大岚山与官军李光弼进行过激战。唐懿宗时有裘甫率义军万余人，经大岚山休整。裘甫牺牲后，余部刘从简突围至大岚山，继续同官军死战。宋宣和二年（1120），方腊起义军亦曾挺进大岚山，多次击退官军，直插浙南。明末清初，黄宗羲与王翊的抗清义军在大岚山驻兵结寨，抵抗清政府的残杀，进行自卫战争。康熙年间，龚万里、张念一、朱三太子等又先后起兵于大岚山，与官军展开斗争。到咸丰年间，又有十八局佃农起义军在黄春生的率领下，进军大岚山，以迎接太平军的东进。正如元代文学家戴表元在《大岚山诗》中所说：“七里黄泥红树冈，西风果熟一村香。居人只道山深好，三百年来是战场。”

四明山发源一水，源自四明山中的大岚山，向北流泻，经越上虞通明堰，转而向东至永思桥回流余姚境内。

姚江初名姚水，在今已失传的古籍《五帝系》一书中早有记载。汉代应劭曾读到此书，说：“姚水见《五帝系》。”姚水边有姚邱山，因在姚水之旁而得名，宋代编写的《元丰九域志》中又说：“余姚有姚邱山。”江水随海潮涨落，朔望子午日为汛期，每天渐迟，周而复始。

江水入余姚境内后，菁江之水注入，又过曹墅桥后有牟山湖诸水注入，碧波回流姚邱山，因名之为姚江。流至姚城西，过兰墅桥分为兰墅江，旧盛产蕙兰，故又称为蕙江，东流至六浦桥，往北分为候青江。主流流经双城之间，径过通济桥，东流出城后，至竹山桥，兰墅江、候青江复来相汇为一。兰墅江汇集姚南诸水，候青江汇集姚北诸水，皆注入于姚江。姚江东过蜀山、丈亭、车厩，至甬城与奉化江相汇，入于甬江，径流入海。

四明山的大岚村境内尚有“姚江源头”所在，并竖碑以明确。

早在远古时代，三皇五帝之一的虞舜出生于姚江边的姚山，《太平寰

宇记》曾写道：“舜生于姚邱。”《孟子·离娄下》也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中亦说：“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又有姚墟，云生舜处也。”姚江之南有冯村，古称诸冯废墟。因舜之故，姚邱山和姚江声振寰宇。因此，姚江又称作舜江。姚江径直流经浙东平原，千万年永不止息奔腾而东，穿越余姚南北双城之间，蜿蜒向东，培植着两岸草木，孕育出两岸生命，滋润着姚江子女。经越几百里奔波而至甬城，与南来之奉化江汇合而成甬江，直趋入海。

宋人王安石曾写有《泊姚江》诗：“山如碧浪翻江去，水似青天照眼明。唤取仙人来住此，莫教辛苦上层城。”

姚江原通海潮，江流与海流互为交融，给水产品的生长形成极佳环境。自1959年在宁波市西郊建成姚江大闸，自此后姚江成为内河。

姚江全长109公里，流域面积2440平方公里，集雨面积2690平方公里。在余姚境内长54公里，接纳支流湖塘江、高桥江、临泗江、青山江、长泠江、西江、中江、东江、慈江等先后汇入的水流，承担起养育姚江两岸生命的责任，是上虞、余姚、慈溪、鄞县、镇海、宁波五县一市的主要航道。

四明山虎踪漫议

国人深知老虎乃百兽之王，故又称之为“山君”，历来与龙并立，称“龙虎”。虎是雄健的猛兽，在国人心目中有着非一般的地位。民间人名中带“虎”字者不知凡几。家中厅堂悬挂上山虎的中堂，以示威严。《水浒传》第七回写到林冲闯入高太尉商议军机大事处的“白虎节堂”，才引出刺配沧州道之恶果。虎威确可震慑人心也。但人们既害怕老虎的凶猛，又喜欢老虎的威武，那就只好敬而远之。

在中国，老虎形象随处可见，早在殷墟甲骨文中就出现“虎”字，后来汉字的“虎”字就很像一只虎。据说汉字中的“王”字也来自老虎前额上的斑纹。在我国境内的老虎有东北虎、华南虎、孟加拉虎、东南亚虎4个亚种，四明山的老虎属华南虎亚种。华南虎又叫中国虎，分布面较为广阔，但野外生存较为稀少。它主要生活于山林及灌木丛、野草稠密的地方。生活习性和东北虎相似，性孤而凶猛，主要捕食野猪、黄犛、水鹿等。没有固定的繁殖季节，孕期100~106天，每胎产2~4崽，3岁性成熟，寿命20多岁。成年虎体重150公斤左右，尾部黑斑最多。属我国一级保护动物。目前，华南虎已面临灭绝，属世界最濒危动物之一。我国当前还有动物园圈养的70多只，全是由6只华南虎种虎所繁衍，是高度近亲繁殖，所以它的野性凶猛度大大削弱。

在汉族民间，有的地区在举行结婚仪式时，喜欢在门的两旁贴上龙虎，象征龙虎左右把门，吉祥兴旺，而对刁蛮的妇女则称之为“母老虎”。还有许多与老虎相关的俗语和成语。有个笑话，说的是老方丈教育小和尚远离女色，一天外出，小和尚看见一位姑娘，看不够。老方丈说，你看见的那个是“老虎”，别看她。可是小和尚自从见过“老虎”之后，就天天想“老虎”，以至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由于虎威可惧，在明代末年竟然有嘉定县沙冈一寺中恶僧，假蒙虎皮，穿虎趾爪形鞋，冒充老虎，

劫夺过往旅客财物。

时至于今，中国特有虎种华南虎数量虽已回升至165只，但整个种群仍是濒危物种。华南虎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的十大物种之一，同时被收录进《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是中国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按《从濒危物种华南虎和百山祖冷杉讲起》（见《开明》2012年第2期）一文所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尚存在的4000多只华南虎被列入消灭范围。1959年，林业部颁发批示，号召“全力以赴地捕杀”华南虎、熊、豹、狼等同一类有害动物。一个错误的决策导致重大的错误结果，1956年冬，福建驻军和民兵捕杀530只虎和豹；江西捕杀150多只老虎；1959年冬，贵州猎捕30多只虎和豹；1963年，广东捕杀17只老虎；雷州半岛也捕杀了17只老虎；1953年至1963年，某专业打虎队在粤闽赣地区共捕杀130多只虎豹。经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持续进行的大规模捕杀，野生虎豹遭受重创，浙江境内的华南虎由此灭绝。于是，现在的四明山早已没有老虎生存之空间。20世纪80年代，华南虎被列入CITES公约保护名单，1996年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的十大物种之一，但已悔之晚矣。

但是，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四明山确实有不少老虎存在。在元明清时期，还发生过较多有关老虎的趣闻。

作为一种凶猛的肉食动物，每当人们谈到老虎时，必然马上会联想到老虎吃人。然而事有必然，也有偶然。例如，四明山的老虎据说好像不“很”吃人。只不过说明四明山的老虎不是绝对不吃人，当它饿极的时候，或者是被人故意作弄的时候，同样是要吃人的。在这里，先讲述一件老虎不吃人，却与人和谐共处的典型事例。而且这事例还发生在大名鼎鼎的余姚先贤黄宗羲先生身上。

黄宗羲老先生的《南雷诗历》中有一首《题简石骑虎图》诗，写得真朴而有趣：

简石禅师骑虎图，下士见之争胡卢。豪猪健狗尚足畏，何况虎乃毅兽乎！
腥风一过鸟鹊噪，依鬼前后相牵扶。安肯俯首出胯下，给公指使同家奴？

梨洲老人谓不然，事固易易言非诬。吾家四明万山中，虎声夜夜绕坐隅。落日一半在青枫，便与牛羊争路途。有时醉踏明月归，拦向溪桥如蒙箕。叱之帖身避道家，不用尺捶相支吾。此非有道习则然，何况公事于浮屠？

从黄宗羲的诗句看来，四明山的老虎与人类和谐相处，的确老实厚道，竟然可与牛羊同途而归，面对美味的羊羔，不去杀生、吞食，真是阿弥陀佛！黄宗羲先生醉后夜归，途遇老虎卧在溪桥边，挡住了黄宗羲先生的归途。黄宗羲先生也确实有趣，既不反身逃跑，更没有浑身发抖，却是用手杖拄地，站在有“山中之王”佳称的老虎面前，给老虎做起了思想工作，仅是用言语叱骂几句。这只老虎也确实可爱得很，竟然听得懂黄宗羲的话。当它听了黄宗羲老人的叱骂，不仅不生气，反而乖乖地起身躲开，给黄宗羲先生让出一条路来。上面所引的这首诗载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并以此证明四明山老虎不很吃人并非子虚乌有。

但老虎毕竟是要吃人的，每当老虎饥饿时，当然得下山探路，入村觅食。史书中同样记载着多则四明山老虎杀生吃人的事例。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在《学箕·歼虎记》中记载：

乙卯贼平，流亡稍集，虎灾异甚。会稽东南黄庙、汤浦之间，广袤数十里，山阜绵错，榛篁杳深，虎盘踞其间，白昼攫搏倚人为粮，出则结队成群，蝉联鱼贯。其中一虎灰质黑章，状独小而喙锐者为之魁。

文中的“乙卯”指康熙十四年（1675），是年，在黄庙、汤浦之间发生虎患，黄宗羲家亦波及之，伤人不少。时隔10余年之后，鉴于虎患多年不绝，黄宗羲只好向余姚知县康如连送上《与康明府书》。黄宗羲在《与康明府书》中写道：“南山一带，虎变异常，两月以来，所伤将及二十余人矣。掩水之下有一小庵，四僧而食其三。今月初五日至初九日，每日而杀一人。四五成群，白昼跳梁。其中一黑虎，锐喙人立，尤为毒害。其次一黄虎，面有白文若川字，与之为副，搏人而食，无有脱者。近山村凤亭、双雁、通德之间，当昼闭户，不敢轻出，樵采路绝。居民釀金设醮，毫无应验。”于是只好请求当时的余姚县知县康如连设法清除虎患，以保

民生。康如连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莅任余姚知县，至康熙三十二年离任，此书信即写于此期间。作为食肉动物，老虎吃人应属正常，人虎和谐只能说是特例。为了阻止老虎给余姚人们造成的伤害，黄宗羲还是主张清除虎患的，所以才有了这封写给余姚知县康如连的《与康明府书》。

于此再引用几则有关四明山老虎的记载。

早在五代时期，四明山的老虎时常出没于姚北的余支湖畔，跑进湖边山村，吃掉不少牛羊，还经常有人被老虎咬死或咬伤，老虎为害乡里，弄得当地群众人心惶惶。湖边小山村有位孝子余四凤，与父亲相依为命，靠砍柴养家糊口。家境虽贫寒，余四凤对父亲却十分孝顺，凡是父亲想要的东西，余四凤必定尽力去办，如果办不到的话，就扔掉斧头大哭不止。有一天，余四凤回家，发现父亲不在，便四处寻找，没有父亲的踪影，问遍乡亲，都说不知道。此时，余四凤想到了山上的老虎，怀疑父亲被虎吃了，便带着砍柴刀，呼喊走进山林，要杀老虎为父亲报仇。老虎被找到了，但余四凤根本不是老虎的对手，结果也死于虎口。说来也怪，自从老虎咬死余四凤之后，随之逃回四明山，从此在余支湖畔的山林不再出现。当地群众平常就对余四凤孝顺父亲深为感动，对余四凤死在虎口之下后连老虎也消失的事情觉得奇怪，于是传言是余四凤死后仍不忘记替父报仇，阴魂依然追赶老虎，老虎最终被其阴魂吓跑了。于是，村民集资在余支湖东岸建祠，祭祀余四凤，希望他保佑乡里。

宋代时，有一山民入城卖山货，手中有了钱，即时跨进酒肆，难得一醉而归。出城进山，酒性发作，随处临崖而睡。时有一虎闻得人味酒气，即时踱近山民，听得酣声如雷，也不敢贸然下口，低下头来嗅山民。由此一嗅不打紧，虎须偶然刺入山民鼻中，引得山民鼻孔奇痒，猛然打出一个大喷嚏，声震山谷。老虎一时大惊，转身奔逃，慌不择路，竟落崖而毙。此山民确实幸运之至，一个大喷嚏竟然吓死一只老虎。时有灌园耐得翁游至杭州，听得市肆传闻，即将此事写入他的《就日录》中。

《元史·孝友传》载：余姚四明山山民石明三，早年丧父，与母独

居。一日，石明三对母亲说：“儿有事外出，需两日后方得归来，娘可去我姊家暂住，我归家时即来接母。”待石明三事毕归来，姊说母亲从未来过她家。石明三心想有异，赶紧奔回家中，却不见老母踪迹，只发现墙壁上新穿了一个大洞。从洞内望去，只见灶间卧着3只小老虎，虎崽边一大摊血迹，尸骨狼藉。石明三心知母亲已被老虎吃掉，顿时心中愤恨至极，乃蹑步轻声进洞，拿起一把砍柴的斧头，举斧杀死3只虎崽。他知道有虎崽必定有母虎，且马上会来寻找虎崽，当即持斧伺立洞侧。时隔不久，母虎果然回来，待母虎探头刚一进洞，石明三迅即用斧头猛斫虎头，即把母虎的头颅砍裂。石明三考虑到有母虎必定还有雄虎，就再寻找虎踪，顺着虎的踪迹，来到一岩洞前，执斧等候在岩石背后。至天色昏黑，果然见有一只雄虎缓步而来。石明三即时从岩石背后跳出，举斧猛砍虎头，竟然将雄虎砍得血污骨碎。而石明三亦一时力尽气绝，死了。但身体仍背依岩崖，手中仍紧握斧头，圆睁双眼，僵立不仆。待村民闻声寻来，才把石明三放倒。后人就在石明三杀死雄虎的地方，修建了一所祠堂，用来祭祀力杀五虎的石明三。

石明三怒杀五虎，为母报仇的壮举，很快传播开来，当时即有隐居四明山的浦江县学者戴良写了一篇《石孝子传》，叙其事迹以做表彰。时隔不久，更有《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在撰写文稿期间多次往来浙东采访素材，听了石明三杀五虎报母仇的事，即把此素材写入《水浒传》第四十三回《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中，让李逵做了石明三的模样儿。

《水浒传》中写到李逵上梁山之后，经宋江同意，回家接取老娘来梁山泊快活。当李逵接得老娘返回梁山泊途中，老娘口渴难忍，李逵便把老娘暂放岭上，到山溪中取水。待李逵取水回来，已不见了老娘。寻到一洞口，只见两只小老虎正在啃吃老娘的腿肉。知道老娘已被老虎所撕食，天杀星黑旋风李逵顿时“心头火起，赤黄须竖立起来，将手中朴刀挺起来，撸那两个小虎”。待李逵杀了两只小老虎，就伺伏在洞内，等待母老虎的回来。不一会儿，“只见那母大虫张牙舞爪往窝里来。李逵道：‘正是你

这孽畜吃了我娘！’”待杀死母老虎，李逵等到那雄虎回来，“一阵风起处，星月光辉之下，大吼了一声，忽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虎来。那大虫望李逵势猛一扑，那李逵不慌不忙，趁着那大虫的势力，手起一刀，正中那大虫颌下”，即将那雄虎杀死。

李逵杀虎与石明三杀虎，基本情节相同，完全是余姚四明山农夫石明三杀虎的翻版，只是石明三怒杀5只老虎，李逵只杀了4只老虎，少了一只小虎崽而已。其他如两人均是孝子；均起因于老娘被虎所食，为娘报仇；两人杀虎的过程相同，都是先杀死洞内（屋内）的小老虎，然后再伏击母虎，之后再上山崖间力杀雄虎；另外还有一点，是作者的故意改变，石明三杀虎用的是砍柴的山斧，而板斧原是李逵的惯常家伙，此次下山前却被宋江截留，宋江不让李逵把此惹眼的板斧带下山去，以致只能用腰刀和朴刀杀虎。至于4只与5只的区别，石明三只是多杀了一只不打紧的小虎崽而已。更有杀虎之后，众猎户对打虎英雄均感觉奇异，两者也是极其相同。石明三与李逵不可能是偶然巧合，必然是来源于同一个事件。

现在再来说女子打虎救母的事件。《明史·列女传》载：明正统年间，余姚有一位姓姚的女子，嫁给同县通德乡一姓吴的农夫做妻子，因为没有兄弟，就将老母接来夫家同住。某年冬天，有一只饿虎于清晨进村觅食，正遇老母出门在院子里汲井水，即扑上去拦腰一口，叨住老母。正在做早饭的姚氏女只听得老母一声惊叫，急忙出门一看，只见一只斑纹猛虎，血口正攫衔着老母，缓步绕过井台，正要离去。姚氏女见状，顿时忘了恐惧，竟飞步上前，蹿到虎后，一把拖住老虎的尾巴，狠命地往后拉。虎欲向前，姚氏女拖得更紧，毫不松手，结果竟拉断了虎尾。虎受痛大惊，血口一张，舍弃了老母，往村外奔逃而去。姚氏女即将老母背进屋内，延医治疗虎伤，竟得痊愈。一农家少妇，在猛虎面前毫无惧色，竟至拉断虎尾，何其雄哉！

清康熙年间，在余姚城南的冠珮村，还发生过一件更为有趣的打虎趣闻。

出余姚城向南20多里，在四明山北麓群山环聚的翠峰丛中，有一小山

村冠珮村。关于这一漂亮村名的由来，是村边有一山峰的岩峦，远看似一顶乌纱冠冕，峰巅下面是一长溜悬岩峭壁，看似豪绅穿上礼服后腰中所系的绂带玉珮，于是就以“冠珮”作为村名。村口有一座邓公庙。庙宇并不高大，前后两进，正殿上方悬挂一匾，上题“除虎安民”4个大字。边上又悬挂一块木匾，中楷细书，记述了邓公杀虎自卫、除虎安民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清康熙十五年（1676），冠珮村边山上有一只猛虎，常进村吃人，民深受虎害。村民集议建土谷神庙，想以此来镇抑吃人的猛虎。有一天，有一外乡人路过此地，日暮，即借宿于土谷神庙内。至晚，有一猛虎突入庙中，向土谷神跪拜，然后开口说起了人话：肚饥难忍，要求吃一个人。谁知毫无心肝的土谷神竟然答应了猛虎，说：“明日晨，有一邓姓人进山砍柴，你可食之。”猛虎大喜，即向神像拜谢后，离庙而去。偷看偷听到此情此景的外乡人甚觉奇怪，天下竟然有这等奇事。第二天黎明，外乡人即离庙入山，探察情由，行路不远，果见一人持砍柴斧进山砍柴。外乡人问：“你姓邓吗？”砍柴人说：“我是姓邓。”外乡人说：“山中有虎，你尽快躲避为好。”姓邓者回答说：“我家有老母，靠我砍柴度日。我不进山砍柴，母亲即会挨饿。我只有进山砍柴，死生有命，我何畏哉！”说完，砍柴人即快步进山。外乡人即在后面跟随，一心想探明结果。当砍柴人即将走近丛菁间时，草丛中果然突出一只猛虎，势欲噬人。砍柴人见状，即举起砍柴斧与猛虎搏斗。血斗无数回合，猛虎却被砍柴人所杀。外乡人说：“奇者斯事！”砍柴人说：“砍柴进山遇虎，世所常有，何足为奇？”外乡人即向砍柴人告知详情，说：“昨夜我住宿庙中，见有一只老虎向土谷神求食人，神答应将你饲虎，不料猛虎反被你所除。”砍柴人一听，当即愤恨万分：“哪有用人来饲虎之理，土谷神太没心肝了。”砍柴人当即背起死虎，来到土谷神庙，对着土谷神像大声斥骂：“你受地方百姓祭供，不保佑百姓，反而害民，是不仁也；允许老虎食人，是不义也。不仁不义，何以为神？”砍柴人的骂声刚完，只见土谷神像的满身泥土自然而然地全化落于地上，而砍柴人见此景况，也欣然而死。当地村民认为：姓邓的以砍柴奉母，是其孝也；果断除害，是其义

也；见死不避，是其忠也；手能伏虎，是其勇也；砍柴人真正是孝、义、忠、勇四德兼全。于是重新雕塑了砍柴人的像，拆除“土谷神”庙匾，悬挂起新的“邓公庙”匾额。土谷神庙就此改成了邓公庙。这座邓公庙至今尚存。

上述记载虽然有所神化，但姓邓的砍柴人利用砍柴斧和挑柴的杠做武器，与虎搏斗，为民除害的壮举，曾博得村民的赞扬，使村民建邓公庙供人们瞻仰，不失为一件美谈。清康熙年间翰林院学士、三朝国史副总裁、刑部尚书王士禛在《香祖笔记》中亦记载了这一事件，予以表彰。据老年人说，在民国时期的余姚火车站候车室内，原有一古石碑，即刻录王士禛《香祖笔记》中对此事的记载全文，以使往来旅客均知悉砍柴人邓公除虎安民之德行，以做表彰。

在四明山大岚镇，也就是“丹山赤水第九洞天”的所在地柿林村的村口，至今还保存有一块贞节碑，它记述了清代时一位农村女子坚贞守洁的故事。事情发生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八月的一天，柿林村的青年沈明忠与大岚镇大路村的姑娘吴一心结婚。时至洞房花烛之夜，发生了一件令人极为痛心的悲剧。

沈明忠的父亲是一个孝子，他让风水先生给自己的父亲，也就是沈明忠的祖父，在伏虎山选了一块风水好的墓地，按风水先生告知，必须在规定的日子内做好，否则风水保不住，婚前几天沈明忠即与父亲相帮做坟。时逢儿子结婚，白天，父亲为儿子操办完婚礼，晚上，仅由父亲一人连夜上山做坟。

时至后半夜，沈明忠好像听见门外有人喊他的名字，并说：“你是个不孝子孙，为什么不去帮你父亲做坟？”沈明忠本是一个孝子，听到叫声，即时告别新婚妻子，起身出门向坟地走去。刚走到柿林村的村口，突然从树林中蹿出一只老虎，猛扑上来，活活地把沈明忠给吃了，只剩下一条大腿。正在做坟的沈明忠父亲和风水先生看到坟地围栅的荷叉（铁栅栏）突然倒地，风水先生说：“老沈，你家出事了，快回去看看吧。”沈明忠父亲赶紧回家，走到村口，即发现一条血淋淋的腿。作为父亲的他，

一时间恐惧、悲痛，真是难以言表。

吴一心，一个农村的弱女子，新婚之夜没有过完就失去了丈夫，太悲惨了。结婚半夜，吴一心没有怀上孩子，为了怀念丈夫决心终身守节，不嫁二夫，在悲痛之中度过了一生。晚年她双目失明，生活艰难，一直守寡到死。吴氏临死之前有一所房产需要有人继承，沈明忠有3个侄儿，决定过继一个给吴氏。吴氏眼睛瞎了，不知道过继谁好。她就让3个侄子跪在面前，摸着谁就是谁，结果她摸着了大侄子。几天后，吴氏老人与世长辞，享年92岁。道光十一年（1831），浙江巡抚刘彬士进四明山微服私访，他来到柿林村，听了这个故事很为感动，即时上奏朝廷，请求表彰。道光皇帝看了奏折后，给吴一心题写了“钦旌节孝”4个字，并命刘彬士给吴氏竖立一块贞节碑，以示后人。道光十一年三月，此碑建成。这块贞节碑就此一直保存到现在。

1955年10月，因建造鹰厦铁路开山炸宕取石，由于被石炮所惊吓，有一只华南雄虎一路北窜，受杭州湾所阻，滞留余姚临山镇境内的仓山竹林潜伏，至晚上即突入农家啮食家畜。是月19日，老虎窜入一家牛棚睡觉，被村民发现，急奔告当地驻军华东公安17师杭州湾武工大队，队长率领战士开枪狙击，老虎逃窜。驻军、民兵合力围追，长短枪共发弹百余发，最后用手榴弹将老虎击毙于仓山下一高平屋内。所毙之虎先送镇海县城物资交流大会展示，后送杭州，由省博物馆制成标本，以供长期展出。

在200多年前还能随处可见的老虎，时至今日，除在动物园里所见，老虎已是十分罕见。而动物园里的虎种是近亲繁殖，降低了老虎的存活率。正由于虎之罕见，才会发生前几年陕西大名鼎鼎的人称周老虎者所炮制之“虎照事件”。自然界老虎之锐减，除掉人类的捕杀，生态环境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前，不仅四明山已无老虎的踪迹，整个地球上所存老虎也已不多，有关统计数字表明，全球所存老虎仅6个种类，总数约6500只而已。因而，老虎已属珍稀动物，是重点保护对象。如再要打虎的话，那可是违犯动物保护法的行为了。现在，人类与动物应该和谐相处，人与老虎更应该和谐相处。